

童年手册

澡堂里没有冬天

鲍尔金娜

虽然对这种戏剧风味喜闻乐见，但毕竟守住自己的位置更重要，便默契地腾出一小圈地方，方便她俩尽情互踹。两个阿姨不断滑倒在地，又不断爬起来，找下一个机会把对方扫倒在地。我远远看见水花在地上接连拍出巨型的白沫，光滑的啪啪撞击声找不到源头，只能听见“哎呦，你再踢一下试试？”“你试试？”热闹倒是热闹。一直到其中个头稍矮的阿姨大声宣布自己被踢骨折了，旁人才上去把她俩拉开。得胜的阿姨舒展腿脚，回到那优秀的莲蓬头下享受热水的供奉，冲洗自己身上战斗的痕迹，一边往地上啐唾沫，侧脸看上去非常像射水鱼。说自己骨折的阿姨则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身量瘦削的年轻姑娘所在的莲蓬头下，一个大拧把把她拱出水流。“瞅什么瞅，你都洗完了还不走？”年轻姑娘怔了一会儿，在澡堂子里转了半圈，回来拿起自己的洗浴包低头出去了，谁都看出来她没洗好。两位阿姨隔着七八个莲蓬头又互骂了几句，观众都失去了兴趣，这事就算翻篇了。“哎呦我去，烫死个屁的！这水怎么跟精神病似的？”一个浑厚的女中音不知道从哪儿喊了一句。大家都笑了，也有跟着一起抱怨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没什么感想，但到底放松下来了，继续用护发素揉头发，一边静静地盯着薄荷绿的旧墙砖出神。在任何地方发呆出神都是我的长项，尤其澡堂子里也没什么其他可以追求上进的地方。我喜欢看地上四处流浪的头发团，盘旋上升到天棚的半透明灰雾，墙壁下林立着的充满脂肪团的大腿。那些鲁本斯风格的女人谈不上好看，也谈不上难看，对于那种朴素坦白的生命力，我小时候根本没有形容词。澡堂最里面有一个高高的长方形泡澡池，跟地板连接的地方有淡淡的霉块。池水轻微带绿，总有个把白腻的胳膊在水面浮着。胳膊轻微一动，水就溢出来一片，泼到滑腻的地砖上，发出浪头拍打海面的声音，有那么一点恶心，也有那么一点诗意。莲蓬头下强劲的水流好像有自己的嗓音，总在我冲头发时咕咕嘟嘟地说话——“外面的冬天多烦人，跟你都没关系。”进澡堂之前的种种不乐意都被冲刷干净了，我像穿上了水做的黄金圣衣。直到想起出去后要在寒气里穿上七八层衣服，我才又一次忧郁起来。有时候我为了拖延时间故意磨叽，把护发素打了两遍。

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在澡堂子里遇见了熟人，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她的母亲。她们刚进来，抖抖嗦嗦地护着身体四处寻觅空莲蓬头。在澡堂子里身上还干着的人，表情总有点自卑。她母亲看到我和同学对视的表情，一定是认识，就匆匆拽着她走过来，脚踩进水流的边界，算是做了预约，眼神瞬间恢复了尊严。我很窘，同学看起来也很窘，但我俩还是学着两个大人的样子，硬着头皮在莲蓬头下唠了会儿嗑。

“你作业写完了？”
“语文写完了，数学还没写。”
“我也是。咋整？真不想写。”
“明早借别人的看看。”
“就怕老李看见。”
“早点去。”
“嗯，那我走了，你好好洗。”
“行。”
周一早上我俩见面时，又都有点尴尬，但说话时胳膊甩来甩去的动作里到底透出一份秘密的亲切。第一堂课下课后，同桌用格尺敲我的脑袋。“你白了。又洗澡了？”我毫不扭捏地点点头。后座的女生听见了，薅住我的衣领研究我后脖子的肤色，撇撇嘴说：“我昨天也洗了，你们都没看出来我也白了？”我连忙说看她脸蛋子好像是有点白了。同桌说没看出来。“我后天还去洗，你等着！”后座急了。其实我也没看出来她变白了，但我还是坚持说她白了，那场面多少有点像《皇帝的新衣》。我再去看同桌，他脸色铁青地给手里的橡皮分尸，嘴里唧唧咕咕。后座似乎突然明白过来什么，一脚踢到我同桌的凳子腿上。“你上次洗澡是啥时候？你就没白过，还腆脸说别人？”
两个人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我趴在桌边给他俩腾地方，闻着自己头发里的香气，差点睡着了。

我的本名是“以平”，号名为“修”。
原先，我父亲为我取的号名叫“修之”，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取“修之平之”之义。当时年纪还小，觉得文绉绉、空洞洞的“之”字不好，又受“胡适”与“胡适之”名字的启发，觉得两个字的“胡适”，比三个字的“胡适之”，简洁明快，好写好记，于是就决定叫“严修”，把“之”字这个尾巴割去了。
想不到，我这个割了“之”字尾巴的“严修”，却与一位名人“撞了衫”。
五十年代初，我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有一天，郑叔中老教授对我说：“你与清末民初的天津名人严修同名，知道吗？”我惭愧地说：“不知道。”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到图书馆查阅天津严修的有关资料。一查吓一跳，原来天津（严范孙）是当时政坛、文坛的闻人，他是袁世凯的“直友”，劝阻过袁世凯称帝；他是南开大学的“校父”，与校长张伯苓齐心协力，艰辛创业；他是周恩来的“伯乐”，早就认为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并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对这些情况我过去一无所知，真是孤陋寡闻，冒冒失失地取了与他相同的名字。
严范孙（严修）生卒年是公元1860—1929年，比我年长七十四岁，

我们总要把石榴留着。我家后院有两棵石榴树，西面甜石榴树，东面酸石榴树。春节过后不久，石榴花开，黑枝绿叶间，红红的一闪一闪；待到春夏之交，枝头便结出浑圆墨绿的小球儿；夏天汹汹而至，小球儿渐渐胀大，渐渐咧开嘴巴，露出剔透的红牙。酸石榴树周围不单有枇杷树，还有老屋和一片竹林，或许是因为背阴，石榴成熟得要晚一些。甜石榴差不多吃完了，酸石榴才熟透。酸石榴的籽儿似乎更红，红得发黑。回想起来，就连它的花也似乎更红一些。可惜的是，酸石榴结的很少。

最后剩下的石榴，往往是悬在酸石榴树枝的末梢。枝头那般细弱，石榴那般沉重，贴着瓦屋顶悠悠地荡过来又荡过去。我用棕衣包裹住石榴，以防防馋嘴的鸟儿。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石榴皮干得起皱了，破裂了，裂缝里，隐隐透出艳丽的红。

得等到八月十五这天，我郑重地爬上树，小心翼翼将最后两个石榴摘下，托在手中，再慢慢爬下树。这就是晚间桌上的一分子了。然而，我知道，石榴并不是今晚的主角。主角们，还得到街上去买。

有时候去保场街，有时候去仁和街。中秋这天，任何一条街上，最不缺的就是人，还有那些让孩子们期待了一整年的吃食。除开拽梨、甜柿、苹果、葡萄、核桃、土瓜这些水果类的，还有厚实酥松的鸡蛋糕、长条形的面包（很多年后，才知道书上所说的“面包”不是这个样子的）、剥开一层还有一层的圆圆的白饼，还有芙蓉糕、鸡骨糖、落地松糖、冬瓜钱、赖饼……当然，还不能缺少一大块直径二十厘米左右的月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很多地方的月饼只有巴掌心大）。

有一年，大概是忙于作业，我们没和爸妈一起上街。爸妈让我们写张单子，把我们想吃的都写上去。单子是铅笔写的，郑重地列出十来样东西。爸妈到街上，遇到大表哥，大表哥看了单子，笑说，怎么会要面包？爸妈回来和我们说这事儿，我有些不解，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很多年后想起，才知道表哥是笑我们想买的太平常了。然而，也就是这些平常的东西，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期盼和欢乐。

我们还期盼着亲戚们上门拜节，他们来了，自然也会带不少吃的来。但家里实在没多少亲戚，常常来往的，不过由旺街大姑妈家，还有山邑二姑妈家。他们来了，往往是扔一堆东

云边路

西，说不了几句话，又得匆匆赶回去。我们有时候也出门拜节，只有外婆家一个去处。我们买一些东西送去，又拎回一些东西。不记得是哪一年——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吧？从外婆家出来，天色昏黄了。是爸一个人骑单车，前前后后带着妈和我们两兄弟。从永平村骑到施甸街，再骑到仁和街，天色完全暗下来了。远远近近，灯光点点。不单是平地上，就连四围的高山上，从半山腰到山顶，都能看见点点星光。抬起头望，东山之山，夜空浩淼，一轮圆月已经升得很高了。

这场景让我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孤独了。还好，爸使劲蹬着单车，咻咻喘息着，多少让我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暖意。

更多的年份，要等到月亮升高，可不是这么轻易的。好容易吃过晚饭，好容易挨到太阳落山，好容易等天黑了，月亮仍然没升上来。堂屋中间的桌子已经清空，好摆放甜食。而那些甜食，仍放在我们住的屋里没拿出来。我们跑进大院，抬头朝屋顶后望。老屋坐南朝北，屋后隔一条窄窄的村路，即是大片竹林。竹林后是背后山，山上也有好几丛竹子，半山腰还有一棵全汉村最大的松树。大松树和那几丛竹子隐隐现出轮廓来了。我们知道，月亮在东山那面，哼哧哼哧，正往上爬呢。再跑进堂屋，催促爸妈摆甜食，爸妈不为所动，说月亮还没上来呢。再看着对门大爹家，屋里亮堂堂的，正中央的桌子已经摆满了。我们内心的焦灼愈发难以掩饰。

月亮——出来咯——不知道是我，还是弟弟，最先在大院子里喊。

月亮高悬着，很远又很近。背后山上那几丛竹子，那一棵婆娑的大松树，皮影一般清晰。

慢条斯理的，爸妈一样一样摆出甜食，有的放在盘子上，盘子没有了，便打开包装，胡乱找个位置放下。这中间，也挤了我们白天摘下的酸石榴。桌子正中间的，当然是月饼，圆的一大块，中间拓印了红色的“月”字，衬在有些油腻的黄暗暗的手工纸上。

桌子端到堂屋外，奶奶走到院子里，点着香烛纸火，喃喃祷告。奶奶说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左不过是一些慰劳祖先的话吧。

宁静，月光洒满大院子。奶奶的身影，爸妈的身影，我和弟弟的身影，拓印在虚白的地上。寂静里，虫鸣唧唧，偶尔传来远远的几声狗吠。

桌子重新端回堂屋，一家人团团围坐，我们反倒有些拘谨了，面对一桌子盛宴，不知从哪儿下手好。爸妈说了几次，吃吧，吃吧，我们这才伸出手。我一下子抓住的是苹果。红色的，香甜的，比我的拳头还大的，苹果。我两手攥住它，咬一口，让汁水在嘴巴里漫溢。一口一口，没几口，一只大苹果进到肚子里了。爸笑着说，你把这个苹果吃完了，还能吃得下别的吗？我这才反应过来，是有些失算了。但爸也有失算处，他明显低估了我的实力嘛。那时候的胃大概是气球吧，伸缩性太强了，一不小心，就能吞并四海八荒。

佐食的，有电视节目，还有爸妈的故事。那时候电视频道实在少得可怜，大多数频道播放的只是漫天雪花——虽然，那时候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雪花。所以，佐食的，更多的是爸妈的故事。

有个故事，妈几乎每年中秋都要讲一讲的。说的是她很小时候，家里编筐卖，卖了买粮食吃。中秋到了，家里没余钱买甜食，外公早早打发妈妈两姐妹睡觉。这时候，有个人闯进院子来了。是白龙水的小金，他曾让我妈做干妹子。外公说，小金你怎么还不摆饼子？！外公拉过他，悄声说，钱都没有，摆什么饼子。小金摸

石榴

甫跃辉

出两块钱递给外公，说那也不能不过节啊。外公接过钱，赶忙来到街上，街上还有些小摊。外公买了一小包“包装饼”——里面什么类型的饼干都有一些，相当于全家福吧。回家后，叫醒两姐妹，总算囤囤过一个中秋。不知怎么，那小金让我无端地想到，后来在《红楼梦》里看到的醉金刚倪二，“虽然是没皮无赖，却因人而使，颇颇的有义侠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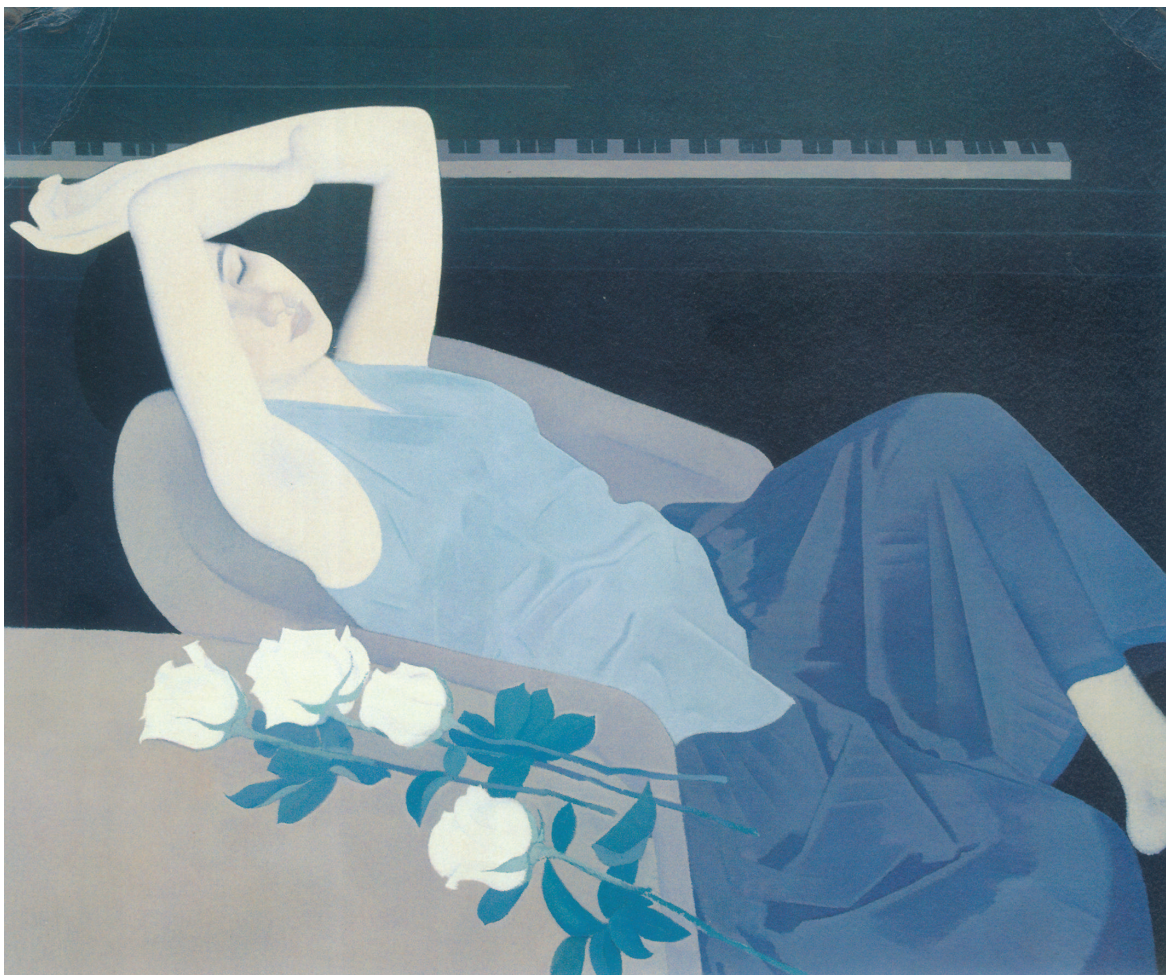
爸的故事来自更遥远的时空。爸说，古时候有个秀才，想到一副上联：半夜二更半。自觉很有趣，却怎么也想不出下联。找人打下联，也没人能对得出来。因为这事，书生郁郁而终。后来，每当半夜，若有人从书生住处门口经过，必然听到他的鬼魂在默念，半夜二更半，半夜二更半。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了那个地方有鬼。这年中秋，有个行路人经过，又听到书生在念，半夜二更半，半夜二更半。行路人倒不害怕，想一想，接道：中秋八月中。那暗夜里的鬼魂叹息一声，消失无踪，再没出现过。

这个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一个人竟然能一句话而死，就算死了，仍然对这句话念念不忘。超越生死，执着如斯，怎能不让人动容。

多年以后，我才知这个故事尚有别的版本。有人说这是金山寺长老给金圣叹出的上联，直到被杀前一刻，金圣叹才对出下联，故称为“生题死对”；还有的说，是苏轼考三个儿子，对出下联的是三儿子苏过。然而，我仍然觉得，我爸讲的那个版本，才是最为动人的。

故事讲完，吃饱喝足，我们不愿睡下，但终究睡下了。卧室的毛玻璃窗，灰蒙蒙地亮着，如同瞌睡的巨眼。窗外虫鸣唧唧，偶尔听见一两声遥远的狗吠。

第二天一早，爸妈很早到田里去了。我们睡到自然醒，睁开眼，恍恍惚惚，想起昨晚是八月十五啊，很多东西还没吃完啊！顿时清醒过来，穿一条小短裤，赤脚跳下床，跑进里屋，打开柜子：半块月饼，几根火腿肠，半瓶鸭鸭蛋罐头，两个酸石榴……酸石榴皮干皱着，破裂处露出的籽儿，红得格外艳丽。这是我小心珍藏了多久的石榴啊，昨晚竟然完全忘记了它们，这让我既歉疚又惊喜。把这些东西拿到床上，一一铺陈开来，简直比昨晚还要丰盛了，每一样的滋味，似乎也要远远胜过昨晚的。



安闲 (油画) 王羽天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此严修非波严修

严修

在我出生前五年，他就去世了，与我没有人生交汇。然而，我与他的孙子却有一次奇遇。八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神户大学任教，山田敬三教授陪同我到神户孙中山纪念馆参观，在进馆签名簿上签名时，我身后突然有人说：“嗨，你和我祖父同名！”回头一看，是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中国人，操北方口音，无疑是天津严修老先生的贤孙。我笑道：“对不起，真是冒犯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世界很大，人海茫茫，是什么机缘让我在异国他乡巧遇天津严修老先生的后人呢？

1984年11月，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会余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孙常叙先生对我说：“五十年代，我在《中国语文》上看到过你的文章，（按：大概是指1955年在《中国语文》上发

表的《略论叶斯丕森学说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那是我大学三年级时的一篇文章。）原以为作者是一位老先生，想不到是你，这么年轻。”孙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六岁，在他的眼中，我可能比较年轻。后来我转一想，孙先生所说的“老先生”，也许是指天津严修老先生吧。
十多年前，北京超星数字图书馆派人来复旦大学拜访一些教授，请求作者授权。临走时送给作者两张卡，一张“超星读书卡”，一张“书生·作者卡”，由于操作过程复杂，科盲的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姑且当作纪念品吧。有一天，突然接到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电话：“请问，《严修日记》的作者是不是您？”我答：“不是。其作者是老前辈严范孙先生。”其实，他们无需打电话来问我，只要翻阅一下日记的时间和内容，就可以弄清楚作者是谁了。

2014年2月，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失眠时的文字游戏》，编辑部将此文转发到网上时，文前却多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佳致当为一方最”，下联是“新诗说尽万物情”。这是一幅书法精品，作者是“范孙严修”。其编者按颇为幽默：

“编 saying：给大家搞个笑，题目来个错配。这副对联落款严修，但彼严修非此严修，那是清末民初教育家、书法家严范孙。不过，倒也正可看出，文字的魅力，怎么在一代代文人中相传。”

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把“之”字尾巴割掉，如果叫“严修之”，大概可以避免一些误会吧。
我的名字还有几则花絮：
许久前，我在某报副刊上发表一

篇文章，作者名变成“严多”。当时出版物中还出现了“垚垚”（墙壁）、“芒芒”（蒙蔽）、“刁伺”（雕像）、“仄仄”（儒家）等怪字。它们来源于七十年代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有一天，在通往复旦大学宿舍区的国年路上，历史系的蔡尚思老先生遇到我，气呼呼地对我说：“你们中文系怎么乱改汉字！”我笑着说：“蔡老，你责怪我们中文系了，……”蔡老听到我的一番说明后，怒气稍解，口中说着“乱搞！乱搞！”缓缓离去。该方案不久就宣布废除。虽然推广执行的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退休后，我从校本部的宿舍区，搬到江湾镇的复旦小区。有一年秋天，我到附近的江湾医院注射流感疫苗，呼号的护士小姐叫到我时，微笑着：“你去年也来打过的，你名字我记得。”我十分惊讶，来她这里打疫苗的人很多很多，隔了一年，她居然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的名字。

护士小姐的话，让我很高兴，说明我的名字确有“好记”的优越性，也就不再后悔当初把“之”字的尾巴割去了。至于与前贤同名，那是无意造成，并非有意攀附了名，那是无意造成，并非有意攀附了名。俗语云：“不知者不怪罪。”我也可以不必为之负疚、懊恼矣。